

香港政情

方靖之

一向野心勃勃的區諾軒近日連番撰文，就反對派所謂「新區選戰略」指點江山，他的文章有兩個目的：一是要炮轟戴耀廷的「風雲計劃」，準確一點是「港獨版風雲計劃」，這個計劃在沒有部署、沒有資源、沒有協調之下，派出大批「港獨」分子出選多個選區，不但是紙上談兵、甘當炮灰，更嚴重影響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區諾軒不斷撰文對「港獨版風雲計劃」冷嘲熱諷，某程度是代表反對派向戴耀廷說不，要他盡快收手，不要再影響反對派的選戰部署。

刻意「漂白」激進形象

二是要為反對派區選下指導棋，顯示自己作為反對派選舉「智將」的能力，繼而對戴耀廷取而代之。日前他又在《蘋果日報》撰文大談區選戰略，又引用毛澤東、又《孫子兵法》，繼而得出一個令人振聾發聵的戰略，就是「民主派各黨至少應該思量對手強弱、選區構成以及候選人特質服務地區，派專業人士到中產區、派年輕人長年耕耘公屋

區。」這不是廢話嗎？誰都知道區選就是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區諾軒的戰略誰都知道，包括反對派一衆大佬，但問題是人選、資源何來？加上反對派一向輕視地區工作、忽視地區議題，在地區上缺乏經營，這些才是反對派在區選弱勢的主因，區諾軒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確實不負「智將」之名。

區諾軒的意見當然不值一提，但這不代表反對派在區選上是無所作為，恰恰相反，汲取了以往在區選上的弱勢，汲取了之前幾場補選的失敗經驗，反對派其實也在調整區選策略、地區工作策略，在這次油尖旺區會大南區補選更加清楚看到反對派最新的區選戰略。

由於當區議員莊永燦病逝，當局將於3月24日舉行補選填補議席，由莊永燦徒弟、經民聯的李思敏與反對派推薦的「社區前進」李國權競逐。本來，這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建制派與反對派對決。如果是以往，身為激進社運分子一員的李國權，肯定會大打所謂抗爭牌，將地區問題、社區議題政治化，繼而全力政治攻訐對手，並且不斷挑動地區

上的政治氣氛，而李國權也會強調其「佔中」、社運、激進背景，就如以往的「人民力量」、「社民連」一樣。然而，這次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卻大不一樣。

首先在個人形象上，李國權不再以「佔中」分子包裝，相反外表打扮斯文，一副社區文青的樣子，更加大力標榜其社工身份。在選舉議題上，幾乎清一色是地區議題、民生事項，如果將其名字掩去，隨時令人誤以為有關候選人代表的是建制派。在選舉單張上，宣傳的不是抗爭、政治，而是「扎根地區」、重視民生、「社區充權」等等，這些都是十分的不反對派，也與李國權的背景不同。

李國權是一名激進社運青年，這不是別人說，而是他自己承認，李國權在2016年接受網媒專訪時透露，自己是邊緣青年，生活相當頹廢，在中學會考後曾經做清潔、收銀員、藥房、餐廳和網吧，但每一份工作都不長久。「夜晚就由旺角飛單車去到尖沙咀碼頭，識吓女仔，嗰時都唔知自己想點。」

2014年非法「佔中」爆發，「廢青」李

國權亦有參與，更聲言這是他「人生重要一章」。當時金鐘清場，他就企圖做騷，聲稱要坐着等待被捕。他又揚言被捕不是愚蠢行為，而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云云。

扮關心社區騙選票

「佔中」失敗之後，李國權也沒有關心過社區，而是在2016年與其餘17個社工組成「社福同行」參加選委會選舉，企圖在特首選舉中成為「造王者」，但最終李國權又落選而回。在政治路上跌跌碰碰之後，突然又加入了由工黨前主席胡德珊創立的「社區前進」，並且投入了大南的地區工作為之後的參選做準備。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李國權都是熱衷於搞政治多於服務地區。但何以在補選期間，他的形象卻一百八十度轉變，變得官仔骨骨，變得不談抗爭、不談政治，形象變得溫和溫情，連「佔中」經歷都不多說？這顯然是出於選舉策略需要，這也是反對派一種新的區選策略，就是故意淡化政治，主打地區事務，相反對於政治議題盡量迴

避，目的是要保住反對派基本盤之外，吸納一些中間甚至是「淺藍」票源。

為此，反對派的候選人不能再如以往般打正旗號打政治牌、抗爭牌、對抗牌，更不能派出一班「社運憤青」面目的候選人。原因是在上屆區議會選舉，大班「佔中」分子、「傘後組織」成員大舉落區，以為可以渾水摸魚，結果卻一敗塗地。再加上之前兩次九龍西補選，不論是姚松炎、李卓仁打政治牌，最終卻落敗而回，這些都令反對派反省選舉戰略。

但問題是，反對派候選人都是這樣的背景，都是一班激進憤青，區諾軒說得容易，什麼「派專業人士到中產區、派年輕人長年耕耘公屋區」，但人從何來？所以，反對派的戰略就是派出同一班候選人，但卻採取喬裝打扮，將候選人「漂白洗底」，掩飾他們以往的政治立場及經歷，掩飾他們的背景，再將他們包裝成不講政治的社區工作者，目的就是為了騙取選票，在區議會選舉上實現反攻，出發點是為了讓席而不是為了社區。

資深評論員

大灣區多元化的法制優勢

葉一舟



剛剛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至少在三處地方提到大灣區法制方面的內容，其中有兩處內容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及學習領會。

第一處是在《規劃綱要》的開頭部分論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與挑戰時，提到「粵港澳社會制度，法律制度不同，分屬不同關稅區」；第二處則是在闡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基本原則時，強調要「把堅持『一國』原則與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尊崇法治，嚴格按照憲法與基本法辦事」；第三處則是強調要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加強三地間的法律合作。

不應誇大協同發展阻力

在筆者看來，上述三處內容構成粵港澳大灣區在法制層面的精神引領。許多學者在論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所面臨的困難時，通常都會指出，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於不同關稅區，因而形成了各種阻礙市場互聯互通的制度壁壘。然而，在「一國兩制」於港澳實施的多年裏，嚴格按照憲法與基本法辦事已經成為中央與港澳間的基本共識、基本原則。尊崇法治、依法辦事不僅成為港澳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也是港澳與內地展開高層次合作發展的「最大公約數」。

誠然，地區間法律制度的不同會為區域協同發展帶來阻力。但這種困難不應被誇大。根據世界範圍內的經驗，即便是在「一國一制」的條件下，區域協同發展也需要解決一系列制度銜接的問題，在立法和執法上進行各種協同機制的建設。這一點不僅在聯邦制國家有所體現，在單一制國家內亦是如此。因此，不應當片面地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內所

包含的不同法律制度、法律傳統就是一個弊端。相反，正是由於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法制差異，使得大灣區具有多元化的法治環境，構成大灣區的獨特優勢。

從世界法制史的角度來看，法制多元化是法治發展的有利條件。不同法律制度、法律傳統間的相互借鑒和相互學習對於提升法治水準而言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與國內外絕大部分地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擁有更好的條件享受法制多元化的犒賞。

法制多元有利法治發展

首先，粵港澳三地語言相通、文化相通、民心相通，能大大減少法律交流的溝通成本，可使得大灣區法制的協同建設效率得到極大提升。

其次，自香港、澳門回歸以來，粵港澳三地間已經就法律協調的問題做了許多工作，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可以很快地轉化為行之有效的制度性方案。

最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有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在有需要的時候能為大灣區的法制建設提供重要的指導與支持。

粵港澳大灣區在建設的過程中應當充分利用法制多元化的優勢，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加強體制機制創新，推動「一國兩制」與我國法治文明進一步向前發展。

為此，筆者建議下列工作可盡快開展：第一，粵港澳三地立法機構間建立長效溝通機制，加強聯繫，合作探索三地協同立法的制度設計與落實方案。第二，粵港澳三地立法機構應充分樹立「大灣區共同體」的主體意識，並以大灣區視角為出發，對一些相關法律做出修改或制定新法。第三，廣東省應鼓勵、支持省內的九個大灣區城市進行制度創新，善用地方立法權，對標港澳，實現三地規則與標準的銜接。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

是無知抑或故意曲解？

政情觀察

楊堅

香港回歸祖國、實踐「一國兩制」快22年了，但是，最近在對待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民族黨」致特區行政長官公函這兩件大事上，香港一些重要人物暴露對「一國兩制」仍缺乏準確認識。

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規定：「本規劃是指導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到2035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躍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大灣區內市場高水平互聯互通基本實現，各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動。」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明確指出，要始終把握好大灣區建設的戰略意圖，推動形成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推動「一國兩制」事業新實踐。

政府須做好疏導工作

但是，在香港不只是反對派攻擊大灣區模糊「兩制」界線，甚至建制中有人也持類似看法。

早在2002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5周年時，《內地和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尚未簽署，陳方安生就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稱：「雖然中港兩地的人流、貨物與資金的流通順暢是必須的，但我們必須小心不要模糊了『兩制』的界線。」不知道陳方安生是出於無知抑

或別有用心，總之，兩個經濟體一旦啟動經濟一體化就必定要求制度趨同。就粵港澳大灣區而言，稱之為規則對接。如果堅守香港與廣東經濟分際，那麼，只能停留在粵港合作層次，不可能形成大灣區。如果至今香港一部分居民仍然停留在粵港合作的認識水平，那麼，特區政府必須大力做好疏導工作。

同不能模糊「兩制」界線異曲同工的是，不能被內地同化。其實，無論粵港規則對接還是更廣範疇的文化趨同，都不是香港規則看齊廣東和廣東文化影響香港，實際需要的是「雙行道」——某些規則看齊港看齊廣東，某些規則廣東看齊香港；廣東某些文化影響香港，香港某些文化影響廣東。這裏，不是由誰的經濟體量大來決定，而是看誰的規則和文化更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

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發出公函，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一事表明意見。做法的確是開先例的，但是，體現國家憲法和特區基本法的規定，而有關規定是從特區成立那一刻就生效的。

舉一個通俗的例子。上司在一段時間主要觀察下屬工作而少給予指示，不等於上司沒有指示下屬的職權。所以，在中央公函公布後，無論稱中央沒有干預特區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還是稱中央公函不是干預，也許是出於善意，其實都是在畫蛇添足。在這裏，根本不存在「干預」或「不干預」問題，而是中央行使憲制權責。

維護國安形勢嚴峻

有人提出一種解說：中央發公函證明中央對「香港民族黨」一事知之不多，否則，毋須行政長官向中央報告。這種解釋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中央不可能不掌握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全面動態，這是中央領導香港的必要條件。

第二，中央在特區依法處理了「香港民族黨」後，要聽的不是關於如何處理的流水帳，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如何遏止「港獨」，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在香港，打正旗號追求「港獨」的組織不多、人數很少，但是，不止「香港民族黨」一個。禁止了「香港民族黨」運作是否萬事大吉了呢？否。其他幾個「港獨」組織是否也依法禁止運作呢？有些人有網開一面的打算。這一切，在中央發公函後，應當盡快糾正。

「港獨」的政治基礎是「拒中抗共」、思想基礎是所謂香港本土認同，此所以「泛民主派」口頭不贊同「港獨」、實際被「港獨」牽了鼻子走，有些人對「港獨」分子存惻隱之心。

至今，各種關於中央公函的正面解讀都對，但都忽略了重要的一點——中央公函不是僅就遏止「港獨」而發，而是還提醒香港特別行政區，今後相當長一段日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形勢將愈益複雜而嚴峻。

君不見，2月13日，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在香港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演講，對港美關係還吹「溫和」的風，稱中美貿易談判與港美關係是兩個分開（separate）的議題，外界將兩者看成一件事，並不準確。中美關係緊張或引起人們擔心情緒，影響投資，這是中美貿易談判影響到香港的關係，但亦是唯一關係。

但是，不出半個月，2月26日和27日，同一個唐偉康卻接連攻擊「一國兩制」，威脅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2019年報告將對香港發表更嚴厲的評論。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必須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扛起來。

資深評論員

中美關係

張敬偉

起訴美加政府，華為這樣做就對了。莫名其妙，華為首席財務官（CFO）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並將按照美加引渡條例展開引渡到美國受審的法律程序。此舉，加拿大視為本國的法治行動，但是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將之和中美貿易聯繫在一起的說辭，凸顯美加引渡孟晚舟事件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

反訴美加依法維權

對於引渡孟晚舟事件，孟晚舟的律師和加拿大司法機關展開了博弈。引渡案件將延後至5月8日再審理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存在政治因素。既然加拿大講求法治，那麼孟晚舟這方嚴格依法維權，自是應有之義。

除了延期審理引渡案外，孟晚舟還反訴加拿大政府嚴重侵害自己的憲法權利。孟晚舟的訴訟書強調，去年12月1日她在溫哥華國際機場被拘留、搜查、審訊時，加拿大政

府官員多次違反法治，因此她就加方公職人員瀆職和非法監禁尋求損害賠償。

除了反訴加拿大政府，華為也在3月7日正式起訴美國政府，指美國去年通過法案禁止聯邦機構使用該公司的產品，是「違憲的」。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3月7日宣讀聲明中說：「美國國會一直未能提供任何證據來支持其對華為產品的限制。」

華為在美加兩個西方大國通過法律維權，算是找準了應對美加的正確之道。

一方面，不管華為如何辯解自己是正常的中國企業，但是因為美國對華的忌憚或焦慮，加拿大又追隨美國，華為就成了美國對華博弈的犧牲品。當然，華為技術也構成對美國和西方企業的威脅。於是，華為因為是中國著名科技企業而受到美國抵制，孟晚舟因是華為高管，而被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加拿大拘捕，並啓動引渡到美國的法律程序。

在此情勢下，美國也好，加拿大也罷，對華為和孟晚舟的動作說成是法治行為，憑

常識也很難取信於人。

另一方面，華為被美國抵制、被以美國為首的「五眼同盟」排斥，也給一些西方國家提供了拋棄華為5G技術的「範本」。因此，美國和「五眼同盟」，是以「莫須有」的方式，通過國家意志和西方意識形態的「統一」性，來干預5G市場的競爭。自認為市場經濟國家的美國等西方世界，以權力干預和意識形態偏見排斥華為，不僅影響了華為的市場利益，更以不當法治的方式抓了華為高管，美國和其主導的西方盟友圈「講政治」是真，「講法治」是假。

華為和美國講道理無益，用投資和善意也難以感化某些西方國家。而且，作為中國企業的華為，在中國政府和民衆為華為叫屈的情況下，也被美國和西方國家解讀為華為具有國企背景和威脅西方國家安全的「罪狀」。

華為一系列「非常中國」的處理矛盾方式，最終被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看成了「好欺負」。在此情勢下，華為採取法律維

權的模式，也算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既然美加是法治國家，對華為和孟晚舟的一切動作都是法治行動，華為在美加依法起訴兩國政府，自然是應有之義。

讓美國人了解實情

美加標榜法治國家，法治正義包括實體和程序兩重正義。加拿大警方明明是受美國之託拘捕孟晚舟，但在拘捕孟晚舟之時沒有向對方「實話實說」，所謂法治程序也不攻自破。程序違法，逮捕孟晚舟也失去了法治正義。雖然這和美加引渡孟晚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孟晚舟反訴加拿大政府，也捅破了加拿大政府一再標榜的「法治國家」那層窗戶紙，讓加拿大在國際社會丟了面子和裏子。

美國對華為的限制和對孟晚舟的引渡，自然是赤裸裸的不講理。華為起訴美國政府，是以美國之法治解決美國的不講理。對付不講理的美國，也只有祭起法律武器維權了

。本次法治維權，華為採取的是精準定位方式，指向《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第889條。這兩條直接導致美國政府禁止美國所有政府機關購買華為設備和服務。但對華為而言，這兩條也充滿市場歧視——美國政府直接干預了市場競爭。美國政府是否以政治干預法律，起訴政府在美國是很正常的事。因此，華為起訴美國，符合美國法律常識，即使結果不好，過程冗長，也給中國企業在美提供了正確的法律維權途徑。

進入法治途徑，也能吸引更多的美國媒體和民衆關切，華為遭受的市場不公待遇也會被更多美國人了解。法律維權，要比中國政府和民衆的憤慨和支持（甚至會幫倒忙）更有意義。

更重要的是，華為法律維權，美國法院不敢不接招，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應訴。不管華為能否贏得勝利，法律維權都是華為擺脫困境的有力手段。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